

政府债务管理重在平衡“用”与“度”

政府债务管理，一头连着发展、一头系着安全。最新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5年末，全国政府债务余额超百万亿元，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总额102.5万亿元。如何进一步用好政府债务政策工具，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。

政府通过适度加杠杆、扩大有效投资，进行跨期资源配置，能够有效托底经济运行，这也是各国财政政策的通行做法。政府债务本身并不可怕，关键不在“要不要举债”，而在举多少债、如何管理、怎么使用、能否偿还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要在发展与安全、“用”与“度”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。

政府债务之“用”，在于其是发展的加速器。近年来，政府债务正在成为我国宏观调控越来越重要的工具，也是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有力抓手。

今年，我国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创新高，达到11.89万亿元，更大力度扩内需、稳增长、促转型。其中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.4万亿元；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.3万亿元，持续支持“两重”建设、“两新”工作等。这些资金，既有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也有用于具体的民生实事。目前，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

当前财政收入承压与刚性支出并存，对债务管理的精细化、科学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一方面，继续开好“前门”，充分发挥政府债券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坚决堵住“后门”，持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

国债“两重”资金支持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，2.4万亿元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建设项目超过1.8万个，为带动扩大有效投资、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，充分显示出政府债券发行使用的突出成效。

政府债务之“度”，在于要守好安全底线。政府债务如果超出合理边界，或者管理不到位，就会产生严重后果，甚至是系统性风险。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、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，统筹确定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和新增政府债务规模。加强政府债务“借用管还”的全链条管理，把防风险、强监管摆在突出位置。总体看，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，风险安全可控。

一些地方存在的隐性债务、融资平台乱象，破坏财经纪律，带来风险隐患。近年来，我国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一揽子化债政策落地见效，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

务，存量债务风险有序缓释。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，持续保持“零容忍”的高压监管态势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。

从中央有关部门通报以及审计报告可以看出，一些地方仍存在新增隐性债务、化债不实等问题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。当前财政收入承压与刚性支出并存，对债务管理的精细化、科学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在提出“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”的同时，也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，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。

一方面，继续开好“前门”，充分发挥政府债券的作用。优化政府债务规模结构，更好地支持补短板、惠民生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，优化专项债券用途管理，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工

作，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坚持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，让宝贵的资金充分发挥应有效益。

另一方面，坚决堵住“后门”，持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强化债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管控，健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，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、化债不实等行为。加强政府债务监测监管，把所有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纳入统一监管，推动债务全口径、全覆盖管理，让每笔债务都看得见、管得住。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实现从“被动化债”向“主动管债”转变。

善用债务、严管债务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，经济社会发展将会获得更强劲动能。



数智技术为视听产业破壁

何昶成

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网络故事片《热血大陈岛》的制作，有效破解了传统红色题材“想拍拍不了”的困境；黄梅戏经典剧目《牛郎织女》依托超高清技术，同步走向北京、上海、宁波、通辽等“第二现场”……一段时间以来，以VR/AR、超高清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，成为促进我国视听产业再造新场景、新应用和新模式，推动多元视听产品创新和驱动视听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元素。

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广电视听成为新技术加速应用的产业场景。从消费侧来看，新技术赋能下的大视听生态，以虚实交融、交互多样的业务形态，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与生活体验。从供给侧看，以新技术为基石搭建的生产、传播及销售模式，正在重塑视听产业流程，不断筑牢我国视听新业态发展根基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深化“5G+4K/8K+AI”战略格局，探索“超清化、云网化、智能化”技术体系，持续深耕行业垂直场景。全国首个视听全产业链园区——中国（北京）高新视听产业园已入驻高新视听企业超百家，建有视听总部基地、视听技术研发基地、视听产业孵化器等功能区，覆盖了视听技术研发、视听服务集成、新业态运营等产业链关键环节。

尽管成效显著，但在快速发展中仍面临

诸多瓶颈。比如，自主研发技术应用性不强，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引导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，资源分布差异较大，文、商、旅、体、展等领域的产业链拓展仍然较为局限。进一步发挥数智要素对视听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，要坚持创新与规范并举，构建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行业自律的多元协同体系。

推动技术协同创新。可规划国家级数智技术高精尖创研中心和共享数据资源平台建设，支持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共建技术实验室，建设一流技术专家库和内容数据库，开展人才培养、技术合作和业务对接，提高技术应用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。

构建智慧监管体系。结合当前我国视听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及行业已有视听版权保护体系，探索数据应用和内容版权协同发展机制，研究以技术自治解决算法歧视、娱乐沉迷、版权侵犯等问题的方案，打造舒适有序的产业环境。

创建融合场景生态。根据现有技术优势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，进一步优化技术研发和应用布局，促进技术赋能视听与文博、文旅、文体等产业融合场景生态建构，探索艺术体验空间、数字艺术展、云剧场、数字比特空间等新型视听项目实践，提升供应链、产业链、价值链的协同联动效能。

安全应急装备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其发展水平关系国家公共安全保障能力。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明确，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.4万亿元，建成10个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、70个特色园区。这标志着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从“有产品”向“成体系”跨越。在各类风险交织叠加、新领域挑战不断涌现的当下，推动产业体系化发展，既是补短板、强弱项的紧迫要求，也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。

产业规模跃升的同时，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回避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，覆盖安全防范、应急处置和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。但高端传感器、工业级控制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偏低，高性能碳纤维、阻燃防水复合材料等关键材料仍受制于人，消防、矿山、水下救援等特种机器人对外依存度较高；大量创新装备因缺少实战场景验证而面临推广瓶颈。因此，在解决“有没有”问题的基础上，还须直面“好不好”“强不强”的现实考題。

强健产业链筋骨，必须筑牢自主可控根基。当前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于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领域，须建立健全产能、产地、技术、原材料及关键装备和零部件储备机制，推动储备由单一成品向多元拓展，增强产业链韧性及抗冲击能力。储备只是底线，竞争

冯利华

托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，加速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无人机等新技术向应急领域深度渗透，推动安全应急装备向智能化、轻量化、模块化方向迭代，从根本上摆脱高端装备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。

更深层的变革，在于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。传统应急装备更多定位于灾后救援，随着治理模式从以“事后救援”为主加速转向“风险源头管控”和“关口前移”，装备需求格局正在深刻重塑。高精度监测预警设备、智能风险感知终端、全域应急通信装备等全链条需求日趋迫切。在湖北恩施，5G+北斗边坡监测雷达对不稳定山体实现毫米级位移实时监测，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“一屏观全域”，将地质灾害风险化解于萌芽，让“治未病”从理念变为现实。产业发展必须前瞻布局，以技术之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根本转变。

体系化推进，还需打通推广应用与产业生态的堵点。产需对接不畅、首台（套）装备市场准入难等问题，仍是制约产业壮大的突出障碍。破解困局，既需政府之手搭建供需对接平台，将一线实践需求精准传导至研发端，用好融资担保、首台（套）保险补偿等政策工具，分散创新风险、降低市场门槛。也要避免一哄而上、重硬件轻研发的倾向，真正培育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、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。

来稿邮箱 mzijgc@163.com



王 铎作

□ 时 锋

漫评

暴走团不能再任性

《民法典》《全民健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(修订草案)》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。其中对“暴走团”进行了规范：未经许可，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，有关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劝阻制止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“暴走团”多次因为占用道路冲上热搜，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矛盾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群众反映强烈却屡禁难绝，既有参与者心存法不责众侥幸心理的因素，也与治理权责模糊有关。本次修订把零散执法经验上升为专门法律规则，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、常态化监管转型，是立法对真实社会风险的专门回应。立法的基础上，堵住“暴走团”的不规范行为，还须配套执法落地，以形成震慑。



扫码观看内容

理赔“大众保单”要更透明更安心

锁凌燕

在全球变暖与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共同作用下，我国极端天气频发，持续考验防灾减灾与民生保障能力。保险对冲公共风险、缓解灾情冲击、稳定社会运行的功能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。

伴随国家社会治理与应急防灾体系持续升级，我国巨灾保险保障网已稳步扩面至20多个省份、118个地市。在保险覆盖面扩大、服务意识增强的基础上，保险功能能否真正发挥，最终要落在赔付上。赔付本身是保险合同的约定，赔付与否、何种赔付，都应依据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事先订立的保险合同来确定，这样才能以一个稳定、可预期、可持续的合理保费，提供一份清晰、可靠、公平的保障。实践中，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，而向个人的合同一般由保险公司单方拟定。为保证约定的科学性，保险合同中充斥着专业术语，包含相对复杂的保险责任、赔偿限额、除外责任等专业条款，大多数消费者不会逐条审阅和理解，因而在遭受损失时，可能会因为之前未注意或者未充分理解的条款无法得到赔付。这种情况往往难以得到消费者的理解和认同。

正因为此，如何在坚守契约精神的同时回应

消费者的合理期待，成为保险行业必须直面的课题。当前，行业在重大事故后的主流做法是在合规框架内优化服务体验。例如，为应对台风“白海豚”带来的挑战，浙江保险业承诺“三免、三简、三开通”，即损失清晰的案件免现场查勘，因抢险救灾、救治伤员、灾情拥堵等导致身故、伤残的客户支持延后报案，特殊场景免应急救援费；简化理赔单证、理赔流程、资金垫付；开通便民理赔服务、7×24小时全渠道报案通道和大灾理赔专属绿色通道。一系列举措让符合条件的赔款更快到达消费者手中。

也要看到，免赔类的“速通”难免产生风控疏漏。要在恪守契约精神与回应社会期待之间更好找到平衡，需要在三个层面协同努力。

在制度层面，要完善巨灾保险、政策性保险等公共政策，为商业保险划定清晰边界。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性和系统性，决定了单靠商业保险难以独立承担全部风险。对于农业保险、城乡居民住宅保险等具有较强公共属性的领域，应明确政策性保障的基本范围和保额，确保基础民生需求得到兜底。在此基础上，清晰界定商业保险的补

偿角色，让其更从容地在契约框架内履行赔付义务。

在行业层面，要努力平衡好保险经营专业化与消费者素养差异化的关系。面向大众的保单，应该积极推进专业语言的“减负”工程，让关键责任和除外责任的表述标准化。在销售环节，行业也可以尝试借助智能体等工具，为消费者提供交互式的产品解读体验，让其直观了解保险责任的含义和触发条件。在理赔环节，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打开理赔“黑箱”，向投保人实时展示理赔进度、所需材料、审核节点和判定理由，让整个过程更透明、更安心。只有当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被尊重、被理解，保险的社会信任基础才能得以夯实。

在社会层面，持续开展保险知识普及，帮助公众理解行业经营的基本原则。当前，很多消费者对保险的运行逻辑还存在认知误区。例如，有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，任何损失都应该赔。这类认知上的偏差，需要长期、持续的引导和纠正，从源头减少误解，从认知建立信任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
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（以下简称“服贸会”）于9月9日至13日举行。本届服贸会的两个“首次”尤为引人注目：首次在主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“中国服务”展区，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，为世界近距离感知“中国服务”发展搭建起重要窗口；首次在多个专题展同步设立“出海服务”专区，为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。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这场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性展会，正搭建起“中国服务”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。

服务贸易是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板块之一，也是衡量一国开放水平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，2026年一季度，全球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0.5%，二季度贸易增长动能延续。数字服务、跨境知识产权、商务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持续提升，服务贸易的边界不断拓展。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同样跑出“加速度”，商务部数据显示，上半年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.6%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达到53.5%，越来越多高附加值、高技术含量的“中国服务”走向世界，与“中国制造”一道构成我国外贸的双引擎。

也应看到，与制造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相比，“中国服务”走出去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。

一是高端供给能力不足。传统服务占比依旧较高，研发设计、法律咨询、高端金融等专业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，具备全球辨识度的“中国服务”品牌较为稀缺，高附加值服务出口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二是国际规则适配与标准对接存在阻碍。各国服务业市场准入、执业资质、监管制度差异显著，国内服务贸易标准体系建设仍在推进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亟待提升。

三是配套保障体系有待完善。服务企业多为轻资产形态，难以适配传统抵押类信贷模式，出口信用保险、跨境结算、服务出口退税等政策覆盖面和精准度仍待提升，通晓国际规则、精通专业技术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较大。

四是外部环境更趋复杂。个别国家泛化安全概念，在数字服务、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设置壁垒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不降反增，为我国服务出海带来外部不确定性。

服贸会的持续举办，是我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。“中国服务”品牌的成长，离不开开放合作的时代土壤。面向未来，要继续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擦亮“中国服务”品牌，加快推动服务贸易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，进而实现我国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的跨越。

大力培育服务出口新动能。聚焦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绿色低碳等新赛道，实施服务贸易品牌培育工程，支持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，推动“服务+制造”协同出海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“中国服务”品牌和龙头企业。

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制度型开放。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，对标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，在跨境数据流动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。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，推动破除各类服务贸易隐性壁垒，推进重点领域资质互认，不断提升“中国服务”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。

深化多双边服务贸易合作。依托RCEP等合作机制，拓展与东盟、中东、拉美等市场的服务贸易合作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境外服务贸易合作园区建设。扩大优质服务进口，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将“中国市场”打造为全球服务创新的试验场，推动内外市场联通、要素资源双向流动。

完善服务贸易配套服务。用好服贸会等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，放大出海路演、供需对接、项目路演功能，完善展会后的跟踪对接机制，把短期展会流量转化为长期贸易增量。推动高校、行业机构加强服务贸易复合型人才培养。完善公共服务平台，为中小企业提供海外合规咨询、市场信息、风险预警等服务。健全海外投资保护机制，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合规风险和贸易壁垒。